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

(1900-1949)

孟航◎著

史



中西方接触的视野，牵引不同时空的交汇

学术与人生的融合，透射历史与文化的哲思

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是传入的，还是引入的？

一代才女冰心的终身伴侣怎样在燕京大学进行学科『中国化』？

同窗好友青年时代的分歧如何影响了各自的人生道路？

中国第一个做民族实地调查的女子缘何牺牲？

抗战时期的敌机轰炸怎样造就了声名远播的『魁阁』工作室？

乡土社会与现代都市是否存在一致性？

引发世界关注的研究是始于『熟悉』，还是始于『陌生』？

如同一把打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之门的钥匙，带你走进与每个人的

人生、心灵密切相关的知识，一切从这里开始……



人民出版社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

孟航◎著

史

(1900-1949)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 牧 陈鹏鸣
装帧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史(1900—1949)/孟 航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

ISBN 978-7-01-010230-6

I. ①中… II. ①孟… III. ①民族学-历史-中国-1900—1949
②社会人类学-历史-中国-1900—1949 ③社会学史-中国-1900—1949
IV. ①C95-092 ②C9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5588 号

·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史(1900—1949)

ZHONGGUO MINZUXUE RENLEIXUE SHEHUIXUESHI(1900—1949)

孟 航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75 字数:410 千字

ISBN 978-7-01-010230-6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在场的熟悉与陌生	1
第一节 学科史的一条主线	2
第二节 反思的建构	4
第三节 文化·社会·行动者	9
第四节 结构与各章提要	29
第二章 来源审视:学术域与知识传播	31
第一节 重新审视历史	31
第二节 西方的“近代”兴起与近代科学的诞生	34
第三节 社会学与芝加哥学派	40
第四节 民族学、人类学与功能主义	45
第五节 有机体·区位学·功能主义	53
第六节 历史的启示	60
第三章 背景与媒介:进入中国的条件	62
第一节 时代和社会背景	62
第二节 学术背景	73
第三节 学科背景	98
第四节 引入者吴文藻的早年生活	120
第五节 主要学习和实践者的早年	127
第六节 文化传播与行动者	136
第四章 山雨欲来:机构与行动者的结合	139
第一节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139
第二节 吴文藻到燕京	150

II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史(1900—1949)

第三节	帕克来华	154
第四节	对功能主义人类学的早期印象	159
第五节	酝酿之中	161
第六节	矛盾中的转换	165
第五章	初步实践:走向田野和克服困难	167
第一节	学科“中国化”的主张	167
第二节	社会研究社与林耀华义序宗族调查	170
第三节	选择功能主义与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	173
第四节	大瑶山调查与《花兰瑶社会组织》	179
第五节	探索中的障碍	185
第六节	行动者与社会环境	191
第六章	向外与向内:拓展交流和本土调查成果	192
第一节	与国际接轨	192
第二节	费孝通留学英国	198
第三节	内部交流与外部应对	206
第四节	从江村调查到《江村经济》	210
第五节	林耀华留美与《金翼》	217
第六节	方向性问题	223
第七章	边疆研究:战争影响下的学术转移	225
第一节	初到云南	225
第二节	“云南三村”调查	233
第三节	从农村到都市	249
第四节	“魁阁”时期的内地研究	258
第五节	边疆与少数民族研究	267
第六节	中国特色学术发展模式与战争的影响	274
第八章	海外与海内:文化比较和成果转化	277
第一节	海外的整体性印象	277
第二节	抗战后的发展	282

第三节	费孝通的理论化思考·····	283
第四节	相关的社区研究·····	295
第五节	研究成果·反思·评论·····	302
第六节	对于学者分化的疑问·····	306
第九章	多维透视:学术与政治、社会、生活 ·····	307
第一节	政府任职·····	307
第二节	社会参与·····	310
第三节	个人生活·····	313
第四节	学术争鸣·····	320
第五节	天各一方·····	324
第六节	互动选择·····	330
第十章	结论:从意化理论看问题 ·····	331
第一节	对“社区研究”和“功能主义”在中国结合的 总体性认识·····	332
第二节	传播·行动·社会结构·····	339
第三节	理论的创新——意化理论·····	349
第四节	未尽的几个问题·····	361
	参考文献 ·····	373

第一章 导论：在场的熟悉与陌生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积累,而这种积累除了不断进行新的研究之外,还要对学科过去的工作进行总结,对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反思,学科史的研究正是这样一种途径。

从20世纪初算起,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时间有百年左右的时间,在发展过程中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并且曾经中断过。自20世纪80年代学科重建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又经历了30年左右的时间。21世纪,一方面一批老一辈的学者相继故去,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的学者尚未成长起来,在这样的时刻,更需要对学科发展当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及时的反思和总结,以便为今后的发展找准方向,因此,对学术史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从学术史研究的现状来看,“中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界,有关学科史的著述既少且零散,特别是较少在理论的分析上能够拨乱反正,在事实的叙述上比较客观而翔实的作品。这明显地影响了中国民族学界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步伐”(杨圣敏,2005),因此,有关学术史的研究又是紧迫的。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发展过程当中,至今还存留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为学界内外所关心,比方说学科的地位问题,这需要从学术史当中寻找根源;而另一方面,许多历史真相尚未明晰,就连一些刚刚过去不久的事实也渐渐显得模糊了,因此如何挖掘出历史的真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理论归纳是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也是学界公认的难题和尖端课题。

本书的研究想要在某种程度上探索清楚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是怎样走过来的,从而揭示历史事实,并从中寻找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归纳,提出对学科史的新认识。

本书的研究成果,既可以与国内外现有的学术史研究进行相互比较,丰富研究资料,又可以为政府推动学术创新制订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第一节 学科史的一条主线

一、本书的工作

本书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发展史为线索^①,来重新思考学术史的问题,希望能从对学科发展过程的探讨当中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

学科史研究牵涉面非常之广,如果面面俱到,反而容易流于空泛。本书通过抓住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发展史当中的一条主线来展示这些学科的发展历程,力图展示在中国几代学者的努力之下,如何将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学术传统结合起来,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并以此揭示出中国学者对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贡献。

本书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选择这些学科早期发展史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主题,一个是“社区研究”,另一个是“功能主义”,本书通过探索这两者是如何在中国结合的,来揭示早期学者进行学科本土化的努力。

本书的工作主要是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以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人生为经,以这些学者所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云南大学及相关的学术机构成立发展过程为纬,力图深刻地展示出如下内容:

-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诞生
- “社区研究”和“功能主义”如何进入中国,并如何在众多流派当中脱颖而出
- “社区研究”和“功能主义”是如何在中国结合的
- 中国学者如何利用功能主义理论和社区研究的方法,在 30 年代做出

^① 鉴于在早期的进入过程中,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之间相互交织在一起,一些学者往往身兼数个学科,因此,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探讨的时候,并不严格加以区分各门学科之间的界限。

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

- 与之相关的一些学者的生活成长历程
- 该研究群体与其他学术观点之间的思想交锋
- 学术、学者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第二,通过上述历史事件、史实、发展过程的梳理、叙述和评论,以此作为案例,对此种现象进行一种理论层次的探讨,并尝试从中引发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二、为什么要以“社区研究”和“功能主义”为主线^①

对于本书案例的选择,有必要在此作一些简单说明。

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产生于西方。^② 这些学科产生后,各种流派通过各自的渠道来到中国,并且各自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迄今为止,对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在理论和方法上结合比较紧密,产生较大影响,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望的,并且直到今天仍然占据主流位置的,莫过于一批曾经主张“社区研究”,并且受到功能主义影响的学者。

“社区研究”是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当中,作为一种探索学科本土化而提出的基础性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对于这些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功能主义,是一种被引入用来指导“社区研究”的基础理论,运用这种理论产生了一批在这些学科当中具有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从西方人来华进行的社会调查,到中国人自己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区研究”;从功能主义理论的被采用,到具有中国本土特色概念的萌芽,

^① 关于“功能主义”的讨论见本书第一章,关于“社区研究”的讨论见本书第五章。

^② 这里的西方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首先,“西方”这个概念,就非常难以定义。需要指出,从整体上来运用“西方”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西方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在历史上,西方各民族国家的形成先后不一,彼此之间也在发生着互动(战争、贸易、通婚等)。对于各自的相互认识,也存在不同的观念。但这种存在于西方内部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他者”观念,不是本书所探讨的主题。因此为了使本书的论述清楚,本书笼统地将“西方”视作一个范畴。在本书的第二章当中,对“西方”这个概念将有更进一步的解释。

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在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从无到有,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社区研究”作为方法论、“功能主义”作为指导理论,两者在中国的结合,推动了这些学科从外来到本土的转变,这在这些学科早期发展当中留下了清晰的印痕。因此,以此为脉络来进行学科史的探讨,是抓住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有利于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

第二节 反思的建构

为了更好地说明本书的写作思路 and 主旨,有必要先对有关学科史的研究作一番梳理工作。

一、国内有关研究

国内对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史的总结工作,应该说从这些学科在中国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就开始进行了,这些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有的是侧重于通论或概论性质的,如《中国民族学发达史略》(徐,1941)、《我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李,1980)、《略谈中国的社会学》(费,1994a)、《关于人类学在中国》(费,1994b)、《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宋,2003)、《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回顾和前瞻》(陈,1981)、《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秋,1984)、《中国人类学的回顾与展望》(黄,1996)、《中国人类学史》(陈,1996)、《中国社会学史》(韩,1987)、《中国社会学史》(杨,1987)等。

有的是侧重于某一时间或某个特定时期的学科史,如《战时中国人类学》(罗,1946)、《20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陈等,1981)、《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宋等,2004)、《中国民族学的百年回顾与新时代的总结》(杨,2009a)、《中国民族学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展望——基于1978年以来的总结与反思》(杨,2009b)、《中国民族学史(上下卷)》(王等,1997,1998)、《二十五年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成就与问题》(王,2005)、《近代中

国社会学(上下)》(杨,2001)、《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阎,2004)、《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姚,2006)、《中国社会学的发端与扩展》(刘,2007)等。

有的是侧重于某一地区的学科发展史的,如《西南种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岑,1940)、《论我国研究西南民族之今昔及其将来展望》(俞,1940)、《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陶,1941)、《民族学在云南》(江,1981)、《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李,2007)、《光复后台湾地区人类学研究的发展》(黄,1983)、《四十年来台湾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陈,1985)、《台湾民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许,1993)等。

有的是侧重于某个研究机构的,如《十年来之中国民族学会》(徐,1944)、《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人类学的贡献》(张,1991)、《建国前我校人类学研究述略》(容,1994)等。

有的是侧重于理论流派的,如《解放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发展》(欧,1983)、《三十五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发展》(吕,1984)、《旧中国民族学的理论流派》(龙,1988)、《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李,2007)等。

有的是偏重研究方法变化的,如《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韩,1997)。

有的是偏重于学者的,如《中国社会学名家》(韩,2005)等,还有一些相关追踪研究的介绍当中涉及前人的研究(庄,2004)。当然,还有一些教材类的书籍,如《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郑等,2000)、《中国人类学史》(胡,2006)等。

另外,还有一些用英文写的或翻译成英文的学科史研究,如《中国民族学的历史》(Chen,1998)、《中国社会学史新编(英文版)》(郑等,2003)、《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Wong,1979)等。

从中不难看出,这些研究相对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另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这些学科在中国的命运沉浮有关。近年来,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界对于学科史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且有人开始注意到学科史研究本身的问题。这种现象既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从事这些学科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群体对学科发展历程和走向的探索,也从某种意义上表现了该群体对自身在学术界和社会当中所处位置的思考,可以称之为“群体自觉”。

二、国外相关研究

出于学术交流的需要,国外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发展史虽有一定的研究,但总体来说比较少。

20世纪50年代之前,由于一批早期留学西方的中国学者在国外期间跟随当时一流的学者学习,有的回国后还继续与国外保持着相互交流,用外文发表文章,因此,这一时期西方对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一定的了解。

20世纪50到70年代末,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联系阻隔过一段时间,这使得西方一些国家不容易对当时中国的学科发展情况有更多了解。因此,这段时期国外关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发展情况只有零星的报道。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施坚雅写了《新社会学在中国》(Skinner, 1951)。1960年代,英国的弗里德曼曾经写过一些相关的文章,如《在中国的社会学和关于中国的社会学》(Freedman, 1962)以及《社会学在中国:一个简单的调查》(Freedman, 1963)。到了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些美国学者来华,对当时的一些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者进行了访谈,如库伯发表了《对中国人类学家的一次访谈》(Cooper, 1973)。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关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发展的学者,有的有机会来华,有的通过其他方式的接触,了解这些学科的发展情况。一些研究虽从个人学术历程角度但也涉及学科史的发展,如1981年,大卫·阿古什(R. David Arkush)出版了《费孝通和社会学在革命的中国》(Arkush, 1981),1985年,该书出了中文版(阿古什,1985)。1987年10月,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和费孝通进行了一次长达6小时的谈话,并把谈话的相当部分发表(Pasternak, 1988),其中涉及不少20世纪前半期的学科历史。1987年,顾定国(Gregory Eliyu Guldin)发表了《人类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变迁之风》(Guldin, 1987),20世纪90年代又出版了《中国人类学逸史》(Guldin, 1994)。

进入 21 世纪,国外一些学者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史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2001 年,郝瑞(Stevan Harrell)发表了《改革的人类学和人类学改革》(Harrell, 2001)。2004 年,刘新发表了《过去和现在:中国人类学历史的两个时刻》(Liu, 2004)。

国外学者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史的关注,其出发点各不相同,有些是自己的研究涉及中国社会,需要了解中国同行的工作情况;有些是对中国一些曾经留学海外的老一辈学者的人生经历感兴趣;还有些则是对这些学科在中国社会当中不同时期的发展进行一种比较,等等。但是客观地说,由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外一些学者看待这些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有时候也存在“雾里看花”的情况,所做出的一些评论也往往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难以对其中的成败得失、利害关系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三、对前人研究的一种反思

本书无意于此开列更长的书目,有相当一部分将在后文当中提及,这里只就这些学科史的研究做一简评,以提出本书的研究思路来。

本书认为,学科史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述、评、理。第一个层次“述”,就是指对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进行描述、叙述,这个工作基本上是历史学的工作,重在梳理清楚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个层次“评”,就是指对于历史现象进行评论,这个工作当中需要考虑学科的发展脉络、阶段,学科当中发生的经验、教训,学者在学科当中的贡献、学术成果的影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分析总结;第三个层次“理”,就是指从历史当中得出一定的规律性的认识,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把学科史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提出一种对于历史本身(而不仅仅是历史现象)的理解和反思。

从这三个层次上来看前人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即基本上停留在前两个层次上。中国学者的研究,侧重于材料的梳理,有一定的评论,包括对于历史现象的描述,做一定的分期,概括出学科在当时发展当中的一些特点,等等;而西方学者的兴趣在于发现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跟中国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关心这些学科随着中国社会变化其命运如何,并从旁观者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

总的说来,不管是中国的学者,还是国外的学者,之前对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有关学科史的研究,仍然多是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运用的也多是历史学的方法,而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学、人类学或社会学性质的研究,没有上升到一种理论层次的探讨,更没有总结出一种关于学科史的理论模式来。

这就自然的引出一系列让人深入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从理论上去看历史?对于学科史的研究能够构建出什么样的理论出来?这种理论是否能与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其他研究当中得出的理论进行对话?这种理论有什么样的普遍性?更进一步,什么是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学科史研究?这种学科史研究在这些学科的发展当中处于什么位置?怎样突破学科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而不至于陷入单纯历史回顾的窠臼?

针对这些问题,本书拟另辟角度,将把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学科史的探讨纳入以下几个范围之内:

第一,把学科的产生、发展不仅当成一种历史现象,还当做一种文化现象。

第二,从这些学科自西方产生之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过程出发,将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进入中国看做是近代以来中西方接触当中发生的文化传播的一部分。

第三,从这些学科自身发展的脉络出发,对其在中国的发展与同时期在西方的发展进行比较,揭示出其中的相互联系。

第四,把这些学科进入中国后的发展,放置在中国的社会历史场景下,揭示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第五,将学科史、学术机构史、人物史、研究成果的评介、学术思想的变迁等与社会、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着重探讨其相互关系,而不是单个的事物本身。

第六,把这些学科所涉及的中外学者还原成社会行动者,而不是只叙述其学术,注意探究学者人生经历当中在学术内外的多种角色,在不同的文化冲击下所做出的选择,及其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以上几个方面,将构成本书尝试重新审视、总结和书写中国民族学、人

类学、社会学发展史的一个出发点。

另外,关于本书选择的“社区研究”和“功能主义”如何进入中国,如何传播和发展的的问题,由于以往的学科史研究对于这个过程,或者只是只言片语,或者仅是进行稍微的评论,而没有进行系统地、清晰地揭示。因此,那种笼统地学科史书写,就很难让人清楚地了解历史的真实——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事件的背景是什么?这些人物受到怎样的影响?这些人当时怎么思考的……

本书将对这一过程做深入地研究、分析,力图揭示行动者(引入者、实践者等)在探索过程当中所牵涉到的从外在社会到内心思想的多个层面。这个思考和探索的过程也将成为本书进行理论建构的关键所在。

第三节 文化·社会·行动者

一、研究问题

(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学科史研究

对于学科史,本书是将其当成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的,具体讲来,就是将其放在中西方接触的大的历史场景之下来进行审视、观察、论述和讨论。这里来分析一下这种研究的思路。

民族学、人类学本身就是东西方的接触当中产生的,早期的学者被称为“扶手椅上的”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因为他们是凭借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等从全世界带回来的资料进行分析的,这在被称为古典进化论派一些学者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类学家在刚刚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常常是把所研究的地域当成一种与外部隔离的“世外桃源”,这是一种静态的、共时性的方法。在西方人类学内部后来注意到,他们所研究的那些小岛、部落,并非与外界没有联系,而是发生着文化接触的,特别是西方对非西方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不管是对西方的殖民地,还是对许多尚未成为殖民地的地区都存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者马林诺夫斯基,作为田野调查的先驱,就对“文化接触”(culture contact)发生了兴趣,他注意

讨论西方与非洲的接触及所造成的当地文化变迁。^①

20世纪中期以后,在欧洲,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1995)和英国的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 1962)等人开始关注历史在人类学研究当中的作用,“他者”的历史也被纳入西方人类学的视野。这个时期,一些学者在对现实的“他者”调查当中注意到一些现象并非土著自身传统,而是受到西方与非西方接触的影响,换句话说,这种接触并不只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现象,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于是他们开始对这种殖民接触的历史进行反思。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者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的学生们当中,就注意到这种西方和非西方的接触问题。理柯克(Leacock)研究了拉布拉多(Labrador)的蒙塔格内斯—纳斯卡皮(Montagnais-Naskapi)印第安人,他认为当地人家庭打猎的地域并不是旧有的,而是当印第安人和欧洲人早期接触后,在发展皮毛贸易中新产生的(Leacock, 1954)。沃尔夫(Eric. R. Wolf)和西敏司(Sidney W. Mintz)分别对波多黎各(Puerto Rico)的社区进行了研究,沃尔夫关注当地咖啡生产(Wolf, 1956),西敏司则研究了当地种植园当中的糖(Mintz, 1956),两人的观点是,这些商品在当地的发展是由于西方殖民者进入后建立种植园来对欧洲和北美进行供应造成的。有关土著与西方接触过程中产生的“船货崇拜”(cago cult)的研究也在这个时候出现,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的《号角即将吹响》是这方面的代表作(Worsley, 1957)。不管这些研究的结论是否完全准确,至少可以说明历史上西方向全球的扩张对于当地的土著文化是产生了影响的。

20世纪6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开始深化,出现了一些相关专著,如弗兰克(Frank)通过提出这样的观点,拉美的未发展是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当地的剥削造成的(Frank, 1967)。20世纪70年代,西方人类学进一步认识到这种接触对于“他者”历史的改变。沃勒斯坦(Wallerstein)在对资本主义扩张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世界体系”理论(Wallerstein, 1974)。

^① 参见第二章对马林诺夫斯基的讨论。

当意识到西方与非西方同处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的时候,随之而来就可能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些“他者”在卷入这个“世界体系”之前,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在西方殖民者进入非西方之后,这些“他者”的历史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时期一些作品对此种问题进行了考察,如《被征服者的眼中:通过印第安人的眼看西班牙对于秘鲁的征服》(Wachtel, 1977)。

20世纪80年代,对于历史的反思更进一步。沃尔夫在《欧洲和无历史的人民》当中指出那些被纳入欧洲扩张进程的“人民”并非没有历史,他们的历史是与欧洲的扩张史一致的(Wolf, 1982)。约翰内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在《时间与他者》当中对人类学通过时间的构建来制造其客体的做法进行了反思,指出西方的时间观从神圣向世俗的转变,使得人类学者在时间的序列上常把“他者”同“野蛮”、“原始”联系起来,而忽视了“他者”历史的平等地位(Fabian, 1983)。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D. Sahlins)在《历史的隐喻和神话的现实》(Sahlins, 1981)当中力图揭示夏威夷群岛土著是如何把西方殖民者的到来纳入他们自身的传统当中的。此外,还有萨林斯的《历史之岛》(Sahlins, 1987)、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的《从祝福到暴力》(Bloch, 1986)、布鲁斯·卡培法勒(Bruce Kapferer)的《人民的传说,国家的神话》(Kapferer, 1988)、图多夫(Tzvetan Todorov)的《美洲的征服:他者的问题》(Todorov, 1984)等等富有启发性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大量关于文化接触和传播的成果问世,如《不可思议的财产:新世界的惊讶》(Greenblatt, 1991)、《萨满教、殖民主义和未开化的人:一项对于恐怖和康复的研究》(Taussig, 1991)、《殖民主义和它的知识的形式:英国人在印度》(Cohn, 1996)、《含蓄的理解:对于欧洲人和其他人在早期现代遭遇的观察、报道和反思》(Schwartz, 1994)等等。这一时期,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交会当中,也出现了研究中西方接触的作品,如有人研究中英之间接触过程中发生的礼仪之争(Hevia, 1995)。

如果对前面这些研究稍加分析就会发现,20世纪50年代注意到了北美印第安人的贸易、太平洋上土著的“船货崇拜”,20世纪60年代注意到拉丁美洲的经济剥削,到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看法,到20世纪80年代研究“土著如何思考”这样的精神世界,然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对资本主义宇宙观”的反思(Sahlins, 1994)……这种